

錢俊瑞選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钱俊瑞选集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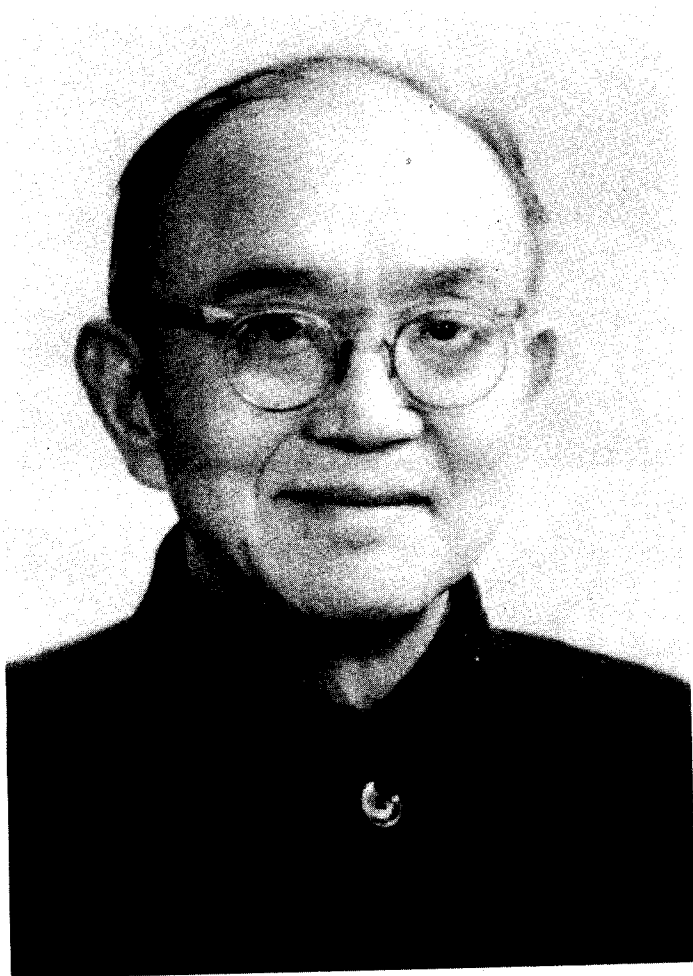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5.325 字数: 575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

书号: 4088·88 定价: (平装) 5.75 元
(精装) 6.85 元



钱俊瑞像



钱俊瑞同志在工作



钱俊瑞同志在国外考察

痛悼廖公
 钱佐清
 廖公一生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八日，廖公在台北逝世，享年八十九岁。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廖公一生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八日，廖公在台北逝世，享年八十九岁。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

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編輯《經濟與政治》

孔孟之道，

自 传

我于1908年9月28日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东乡洪声里镇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曾当过长工和佃、贫农；后来自己置了两亩多地，加上租地耕种，并在桑叶市场上兼当中间人，还开设过石灰行（兼卖砖瓦），经济地位上升为中农兼小商贩。

我在少年时代上过私塾，后进入洪声小学和江苏省第三师范附属小学（高小）就读。由于家境困难，我一边读书，一边由母亲带着干些农活。有一次，我跟着父亲去交租，绰号“铁算盘”和“小锉刀”的地主钱树元嫌租米“太糙”，一脚把米踢翻，还大声怒喝，打了我父亲两记耳光。父亲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还了手，随即带着我逃跑，但第二天就被警察抓去坐牢。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对旧社会仇恨的种子。1919年五四运动传到无锡乡下，我们小学生们在小街上参加游行，高呼反日口号，抵制东洋货，激发了我的爱国思想。

1922年，我高小毕业，升入江苏省第三师范学校。在师范学校期间，一面学习，一面兼任图书馆干事，我看了不少书，研读了一些哲学政治经济名著，开始接受了一点进步思想的影响，十七岁时曾写了一篇评论法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格森所著《形而上学导言》的文章，登在校刊上。1926年，我在国

民革命大好形势下参加了中国国民党，喜气洋洋，迎接北伐军，到农村宣传，1927年“四·一二”事变发作后，即被清除出国民党。

1927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我到无锡县立初中附小当教师。当时，正值江苏省举办民众教育学院。我受陶行知先生思想的影响，决心投入大众教育运动，于1928年考入无锡民众教育学院。入院后到黄巷实验区（黄巷是丽新布厂的工人居住村）从事工人教育工作。教育救国思想，逐渐让位于革命思想，遂为工厂大老板杨翰西所不容，最后就于1930年离开了黄巷，去上海参加农村经济研究工作。

1929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农村组负责人陈翰笙（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来无锡，组织一批革命青年，开展对我国农村的经济调查。我经王寅生介绍，认识了陈翰笙，并参加了他所领导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共调查了22个农村。1930年又去河北调查了保定18个农村。其他同志又在江苏宝山、河南许昌、山东潍县、陕北榆林、安徽二十里堡以及广东的若干个县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我们边调查，边学习。先学习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何上肇的《经济学大纲》，1931年以后又学习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考茨基的《土地问题》等著作，努力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我参加了上述调查资料整理研究工作，参加编写《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亩的差异》和《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资料》等专著。

在对这些调查进行科学总结的基础上，1932年我写了一篇《一九三一年大水灾中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刊于《新创造》，这是我在农村经济问题上的处女作。其后又写了《中国农村经济现阶段性质之研究》、《中国地租的本质》、《评卜凯

教授所著“中国农场经济”》等几篇论文。1934年我参加了以陈翰笙、吴觉农等同志为主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接着又先后组织了“中国经济情报社”和“文化资料供应所”，调查研究整个中国经济问题。1936年，我写了《怎样研究中国经济》一书，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阐述了研究中国经济的科学方法。特别强调按阶级观点，进行实地调查，掌握大量资料，由此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农村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农村经济研究工作，最初由于院长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先生的掩护和默许，得以比较顺利地开展工作。后来影响扩大，便触怒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为了加强控制，于1932年勒令社会科学研究所迁往南京，并任命国民党的忠实走狗傅斯年为所长。傅一上台，便竭力排挤左派。1933年，我被社会科学研究所除名，自南京返回上海，经陈翰笙介绍，到塔斯社上海分社工作。同年参加了“苏联之友”社和社会科学研究会，开始与邹韬奋、胡愈之、金仲华、曹亮、张仲实、艾思奇等人接触并共事。

1934年，我党中央机关遭到敌人的大破坏，中央机关从上海迁移到苏区，但中央文委一部分同志仍被掩护着留在上海。30年代初，在中央文委领导下，组织起左联、社联、影联、剧联、美联、教联等革命文化团体，并组成“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作为总的领导机构。1935年由胡乔木任“文总”书记，邓洁任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1935年9月，我经周扬和胡乔木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文委委员。当时，周扬是文委书记，夏衍、胡乔木、钱亦石、曹亮等为委员。

三十年代中期，我在党的领导下在上海参加各项活动。特

别是组织和从事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国际问题的研究工作。1934年10月，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了会刊——《中国农村》月刊，由薛暮桥主编，我写了些文章，以陶直夫、周彬等为笔名，在月刊和其他报刊上发表。这些文章，除上面提到的外，主要还有：《农作机械化的社会意义》、《评陈翰笙先生著“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中国农村经济性质问题的讨论》，以及《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等等。我们这些人的文章力图用马列主义观点，阐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对象、方法和任务，论证中国农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批判歪曲中国社会性质，取消中国革命的托派分子（王宜昌、王毓铨、胡秋原之流）的理论和乡村建设派等掩盖阶级矛盾的错误理论。

我们组织“中国经济情报社”，调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在这方面我写了《怎样研究中国经济》和《中国国防经济建设》两本小书。关于中国的金融货币问题曾与章乃器等人合作写了专著《中国货币制度往哪里去》，在报刊上又发表了《新币制的透视》、《国际货币战与中国币制改革》和《中国跌进英镑集团以后》等文章。

三十年代初，特别是三十年代中期，整个世界充满了火药味，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为了加强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的了解，在胡愈之主持下，我和金仲华、张仲实等以“苏联之友”社为基础，于1934年9月创办了《世界知识》杂志。该刊是我国最早以马列主义观点和方法，介绍和分析世界政治、经济的专门性杂志之一，至今仍在出版发行。在30年代该刊先后由钱亦石、张仲实、金仲华和我任主编，我们在这个刊物上，曾专门介绍过苏联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加有关世界经济的论述。我在这个刊物及其他报刊上，曾写了些社论和有关世界经济和

国际问题的文章，其中主要的有：《火药气下的世界景气》、《西班牙的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保卫马德里》、《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一九三七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展望》、《太平洋市场的争霸战》等。在这些文章中论述了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附属国的经济特征，分析了在加紧军备竞赛中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动向，揭示了帝国主义战争必然爆发的经济基础。

进入三十年代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华战争的步伐。因此，我除了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外，投身于抗日救亡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当时该所的地下党负责人是张稼夫）组织人到徐家汇办工人夜校，发动工人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我参加了这一工作。当年10月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要求党组织对我在长期实践中进行考察。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后，宋庆龄在上海领导救护伤兵的工作。我积极参与这一工作，反对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

1935年底，上海成立文化界救国会，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和我等被推为发起人；我任文化救国会的党团书记。同年我协助组织妇女界和职业界的救国会。

1936年，在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被迫停刊后，相继创办了《永生》周刊和《现世界》杂志，我曾任这两个刊物的主编。

1936年8月底，陶行知代表全国救国联合会，我代表文化界救国会，陆瑾代表学生救国会和陈铭枢等组成中国人民代表团，参加了九月初在比京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和平代表大会，接着，我受宋庆龄（她是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副主席；主席是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的委托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反法

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当时在法国我还参加了全欧华侨救国大会，并同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参加了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反对佛朗哥的活动。为了推进抗日救国运动，我写了《给救亡同志的公开信》小册子。

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后，我继续从事各种抗日活动。我当过‘全国救国联合会’党团书记，在党中央长江局领导下工作。上海沦陷后，我和邹韬奋、金仲华、沈兹九等辗转来到武汉，创办了《战地知识》和“战时书报供应所”，并和孙冶方、姜君辰等编辑《救亡手册》。武汉失守时，我由党中央长江局派遣，和胡绳、李伯余、刘江陵等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文人到襄樊，作为主任，主持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创办“鄂北日报”，广泛组织战地文化站、文化室，并利用合法地位帮助建立桐柏山抗日游击根据地。1939年初我到重庆，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和人民外交工作，并促进民主宪政。在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下，我写了《汪精卫卖国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及时揭露了汪精卫的卖国行径。

1940年7月，我随叶挺军长自重庆到皖南新四军军部，组建战地文化服务处工作，并在军教导总队为军队干部讲授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皖南事变后，我转到苏北根据地，任华中局文委书记，苏北文化协会理事长和《江淮日报》社长。在江淮日报上我写了一篇长文《论苏德战争》。接着我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长，并在华中党校讲课，直到抗战胜利。

1946年3月，我从山东临沂新四军军部奉党中央令派赴北平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随后任新华社北平分社的代社长（社长是徐特立）兼总编辑，创办了《解放》三日刊。1946年4月3日，我和其他40多名报社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逮捕，同志们在狱中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国民

党反动派被迫道歉认错，释放了全体被捕同志，我们乘车在东长安街作了游行宣传，受到北平群众的热烈欢迎。

1946年5月，我奉命自北平赴延安任党中央秘书。9月调《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任该报社论委员会主任。

1947年3月，在胡宗南率领国民党军全面进攻下，我军主动撤出延安，我随刘少奇、朱德、廖承志等同志经山西去河北，参加华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担任党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同志为书记）当时派出的土改工作团之一的领队；接着下放任建屏县中共县委书记，并参加了中国土地法的起草工作；其后，出任华北大学教务长，校长是吴玉章同志，副校长是成仿吾、范文澜同志。

1949年2月，我以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的身份，出席在巴黎和布拉格召开的世界和平代表大会。随后，我又奉党中央之命任中共代表团副团长（团长刘宁一因事未去），出席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

1949年1月北平解放时，我任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在彭真、叶剑英同志领导下负责接管清华、北大、师范大学、燕京、辅仁等高等学校和各项文化教育机关。其后，协助董必武同志主持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工作。建国后，我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1952年底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1954年10月起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在教育部和文化部任职其间，我先后发表了《学习和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思想》、《用革命精神实施新学制》、《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和《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等文章，阐述了党的教育方针和文艺政策。

建国后，我长期担任中苏友好协会的总干事、秘书长，协助刘少奇、宋庆龄会长，主持该会日常工作，曾多次赴苏和接

待苏联各界友好人士，为增进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了一些工作。

1956年我参加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我曾先后当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第一、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在十年动乱时期我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关押了八年，直到1975年5月才获释放。

1978年，我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到任后，我主持召开了两次世界经济科学规划会议，制订了《1978年至1985年全国世界经济学科发展规划草案》，把世界经济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筹建了世界经济资料中心。我参加发起建立了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并被推选为该学会的会长；参加了《世界经济导报》的创建工作，并被任命为该报社社长。1980年后，我还兼任了国家计委顾问、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和大百科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从1983年起，我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由浦山同志接任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恢复工作以来，我主要从事世界经济方面的调查研究和著述，集中力量于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创建和发展工作。近年来，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著有《世界经济与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马克思与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探索》等书，并主编了《世界经济概论》（上下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纵横谈》等专著。我还主编我国世界经济方面的工具书——《世界经济年鉴》。

几年来，我曾多次参加代表团，前往西欧、美国、日本、

印度考察各国经济，并在瑞士、美国、日本、西班牙参加国际会议，作学术讲演。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虽年逾古稀，仍将以有生之年，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兢兢业业，为党为人民继续效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九八四年四月五日

目 录

上 篇

研究中国经济的方法论

怎样研究中国经济·····	(3)
---------------	-------

中国农村经济

一九三一年大水灾中	
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	(71)
中国目下的农业恐慌·····	(99)
中国农村经济现阶段性质的研究·····	(113)
土地所有的形态·····	(127)
中国本部两大区域的土地关系·····	(141)
中国地租的本质·····	(156)
评卜凯教授所著《中国农场经济》·····	(180)
中国现阶段的土地问题·····	(213)
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	(244)
中国农村经济性质问题的讨论·····	(260)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	(269)
谈谈“土地村有”·····	(300)

经济政策

中国国防经济建设·····	(309)
中国国民经济的总动员·····	(354)
国民经济建设方案·····	(360)
论民生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乎？ 社会主义乎？·····	(369)
中国货币制度往那里去·····	(404)

下 篇

世界经济研究

当前世界经济研究的根本任务·····	(437)
进一步解放思想，落实世界经济科研 规划·····	(451)

世界经济学

为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的世界经济学而奋斗·····	(467)
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探索·····	(487)
世界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	(674)

世界经济问题综述

80年代世界经济、中国经济 和中日经济关系展望·····	(683)
---------------------------------	---------

中 国 经 济 改 革

中国经济的调整和改革·····	(701)
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理论性问题·····	(706)
认真改进我国的经济计划工作·····	(722)
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730)
放开手脚，勇于改革，开创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744)
关于对外开放战略的若干理论问题·····	(769)
从香港问题圆满解决论“一个 国家两种制度”英明构想·····	(779)